

晚清女性知识分子翻译伦理的坚守与局限——以薛绍徽、单士厘译介实践为例

伍海萍¹

(1. 重庆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 重庆 双福 402247)

摘 要: 晚清时期是中国近代翻译史的转型期, 女性译者的群体性崛起为西学东渐注入了独特的性别视角。本文以安德鲁·切斯特曼 (Andrew Chesterman) 的翻译伦理五模式 (再现伦理、服务伦理、交际伦理、规范伦理及承诺伦理) 为理论框架, 择取晚清有代表性的两位先驱女性薛绍徽和单士厘来作为研究对象, 摸索其译介实践所反映的伦理选择及时代制约。本文所涉及的“译介”是广义概念, 囊括翻译文本、游历书写等一切为国人介绍国外文化的实践活动, 薛绍徽在对《外国列女传》等作品译介里, 以对“承诺伦理”的坚守为途径, 设法在传统儒家道德跟西方传入的进步观念中间找到平衡; 而单士厘于自己海外游记里头, 则更多体现出“交际伦理”跟“服务伦理”的结合, 凸显了晚清女性使国人开阔世界视野的责任感。尽管她们于译介工作当中呈现出明显的爱国意识与性别觉醒, 但受时代的情况、传统文言表达的模式以及对男性合作者的依附等因素羁绊, 其翻译伦理展现出突出的历史局限方面, 凭借对薛、单二人的比较审视, 本文将二人的译介实践置于切斯特曼翻译伦理视域下进行提炼, 揭示了特定晚清女性知识分子的伦理选择逻辑与时代局限, 在丰富女性翻译史微观研究视角的同时, 也为探究近代翻译伦理的多元变迁提供了具象例证。

关键词: 晚清女性; 翻译伦理; 切斯特曼; 薛绍徽; 单士厘; 译介实践

DOI: <https://doi.org/10.68249/jrtnla.2026.0017>

1 引言

晚清这一时期的中国正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 西学东渐的浪潮不光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 更锐猛地冲击了传统的思想范围, 在这一转型的时段, 翻译活动成为知识分子救国图存的重要办法, 然而在大规模的翻译史叙事当中, 男权话语相当长的时间主导地位在握, 造成早期女性译者的身影显得模糊又靠边。伴随女学的兴起跟性别意识的初萌, 一批有着深厚家学根基且具备世界眼光的女性开始进入译界, 她们的出现对“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看法造成了挑战, 成为近代文化转型这一时期不可忽视的先锋梯队, 在这个群体的体系中, 薛绍徽、单士厘有着突出的典型价值。薛绍徽通过开展对科学小说和女性传记的译介, 努力在传统家学跟现代知识的体系里求平衡; 单士厘凭借与众不同的域外视角, 凭借《癸卯旅行记》等作品让女性观察世界有了开端, 她们所进行的译介实践, 不只是文字的替换, 更是女性于公共文化领域当中力争发言权的初次探索。

处于男权中心话语以及家国叙事的双重压力之下, 晚清女性译者的翻译伦理体现出一种错综的交织状况, 在译介工作实践当中, 她们要承担起教化大众、服务民族的“服务伦理”, 也要面临传统文人审美及道德规范的制约, 本研究着重探讨的任务是: 在晚清男权话语起主导作用的语境下, 薛、单二人怎样通过文本筛选、做策略改写和进行游记文本书写等译介实践, 呈现出对翻译伦理的依从? 着重钻研她们在开展跨文化交流与社会启蒙工作进程中, 怎样于性别身份的自我明确和社会大众期待之中达成伦理平衡? 尽管她们在各自开展的译介实践上有重大进展, 但时代大环境形成的局限还有必要深入探讨。这种“坚守”以及“局限”的并存, 恰好组成了晚清女性翻译伦理最真实的历史背景。

本文采用翻译史、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与翻译伦理研究相交叉的方法, 以薛绍徽、单士厘译介实践作为研究个案, 基于对比研究, 查看晚清女性知识分子翻译伦理的坚守与不足之处, 这一考察有助于概括她们于伦理抉择当中的共性特征, 进而给处于边缘位置的女性译介活动正名。该交叉视角能把中国女性翻译史研究视野拓宽, 打破一直以来以男性译者为主体的单一评估标准, 还为认识近代翻译伦理的多种发展提供了理论借鉴, 从性别方面重

作者简介: 伍海萍(2001—),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翻译史与翻译伦理。

通讯作者: 伍海萍, 邮箱: 2576565153@qq.com

新审视翻译史，可以让我们于文字的演进中，看到那些于窄缝里奋力显身的女性身影，以及她们为近代中国文化转型所给予的别样智慧。

2 理论框架

本研究制定的理论框架把安德鲁·切斯特曼（Andrew Chesterman）的翻译伦理五模式跟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结合到一起，以给分析晚清女性知识分子的实践提供多维度视角为目的。

切斯特曼的翻译伦理五模式^[1]（再现伦理、服务伦理、交际伦理、规范伦理与承诺伦理）打破了传统翻译研究中“忠实”与“背叛”的二元对立，为考量晚清复杂的译介环境提供了多元工具。这五种伦理模式促进了翻译伦理的发展，对于翻译实践具有重要意义^[2]。切斯特曼的五模式关注的是译者在跨文化传播中面临怎样的伦理选择、承担怎样的责任。再现伦理（Representation）考察译文在原文真实性忠实度上的情况，而在晚清“西学东渐”呈现的宏大语境当中，译者主体性一般更多是被服务伦理（Service）驱动起来，即翻译是为救亡图存或社会改良的特定目标服务的，交际伦理（Communication）所突出的是跨文化对话中的相互体谅。规范伦理（Norm-based）体现了译者对目标语文化期待的顺应，而最高维度的承诺伦理（Professional/Commitment），即切斯特曼所提出的“圣哲罗姆誓言”^[3]，则反映了译者作为文化中介的职业操守与社会责任感。对于薛绍徽、单士厘等知识分子而言，她们的译介实践往往是在多重伦理维度之中寻求平衡的过程，即不仅是在传递异国知识，更是在履行作为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试图透过她们的文章实现跨文化的理解与对话。这种实践在遵从当时文学传统与表达习惯的同时，也体现了知识分子作为文化中介者的职业自觉与责任感^[4]。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为上述伦理模式注入了性别维度的反思。雪莉·西蒙（Sherry Simon）在《翻译中的性别》中通过对“忠实与美貌”（Les belles infidèles）辩证关系的拆解，指出翻译并非单纯的文本复制，而是带有译者性别立场的主动介入^[5]。这一理论与切斯特曼的“再现伦理”相呼应，女性主义视域下的“忠实”不再是对父权制话语的盲从，而是对文本意义的再造与“显身”。晚清女性知识分子的“坚守”呈现出担当民族救亡责任的样子，而其“局限”是社会规范伦理束缚带来的，把西蒙理论跟切斯特曼伦理框架相互参照，能够更全面地考察薛、单二人在文本干预中所具有的性别意识，进而揭示她们在碰到社会企望时，怎样以译介行为构建起女性的文化空间，以及这种尝试在时代限制里面呈现出的矛盾与新开拓点。

总的说来，本研究将切斯特曼的五模式作为横向的描述性框架，负责刻画译介行为的社会属性；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作为纵向的批判性维度，负责解析译者身份对伦理决策的影响。两者相结合，能够有效揭示晚清女性知识分子在文化中介过程中如何处理“他者”与“自我”、“伦理责任”与“性别身份”的复杂纠葛^[6]，这样既守护了译介行为的文化价值，又在实践中拓展了女性的表达边界。

3 薛绍徽的译介实践与伦理分析

薛绍徽实施的译介实践，不光显示出近代女性声音在翻译领域初步觉醒，还依托文本的深度参与体现了其独特的伦理操守。

3.1 译作概况

薛绍徽成为了中国近代翻译文学史上第一位女翻译家，作为晚清翻译相关事务的早期先驱，其译介实践于近代文化转型当中占据着十分独特的重要位置，她翻译事业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自身敏锐的跨文化视野，1900年那个时候，她跟丈夫陈寿彭合译出来的《八十日环游记》^[7]（作者署名房朱力士，即儒勒·凡尔纳不规范的音译）出版发行，这不但意味着中国近代科幻小说译介的起始，也是一回具有开拓性的文本试练。这种由陈寿彭口译、薛绍徽笔述的翻译方式，能看出薛绍徽也属于林纾类型的翻译家。值得一提的是，《八十日环游记》的翻译不是据原文翻译的，而是据桃尔（M.Towel）和邓浮士（N.D.Anvers）的英译本转译的^[8]，但薛绍徽的译文虽也是用的文言，却很忠实于原著，几乎没有删节和增添，颇能体现原著风格，这在近代翻译文学初期实属难得。除此之外，她巧妙地沿用了中国传统小说特有的章回体叙事框架^[9]，人名也做了明显的本土化处理，这是当时翻译文学的普遍做法。这种以本土成熟叙事形式承载新颖异域内容的策略，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文化隔阂，极大地降低了晚清受众理解西方科学幻想与现代地理知识的心理门槛^[10]。

和《八十日环游记》所进行的翻译不同，在《外国列女传》这部撰述里面，薛绍徽更大量地呈现出作为女性译者的主动选择和思想倾向，《外国列女传》作为薛绍徽编译的一部外国女性传记汇集，系英国作家厄冷（Ellen）所创作，薛绍徽没有采取机械地平移西方女性传记的做法，而是把它处于中国传统的史传体例之内，实现了传统形式跟现代内核的良好结合。在系统引介西方女性英雄、科学家及政治家事迹的过程中，她把科学精神和女性意

识精巧地融入传统叙事,让这些有着现代特质的异国形象在当时的评价体系之下具备了合理性,薛绍徽的翻译实践不只是做文字的跨语言转换,更是一番实际的文化协商,她在保留传统审美的基础上吸纳近代科学元素,在形式跟内容彼此的作用里,顺畅达成了从传统叙事至近代文学范式的有序演进,给后续的女性译者开拓了宽广的文学层面。

3.2 伦理坚守的具体表现

薛绍徽的翻译伦理并非只是对文字转换的一味坚守,而是出自她自觉的女性意识以及对文化平等地位的自发索求,这种坚持首先体现了她将翻译视为一种社会启蒙的“服务伦理”这一做法,在从事《外国列女传》编撰之际,她敏锐地认识到传统道德话语对女性才智的辖制,于是没有盲目采用刘向《列女传》上着重“节烈”的筛选标准,她有目的地去挖掘且重塑了一批在政治、军事及科学领域富有独立精神的西方女性形象。通过这种“创造性叛逆”,她将译文转化为呼吁女权、倡导“女学”的利器。在译序中,她展现了极其敏锐的翻译伦理意识和女性主体立场,使翻译行为超越了简单的语言转换,成为挑战陈旧观念、唤起女性社会参与意识的一种伦理责任^[11]。

迺来吾国士大夫,慨念时艰,振兴新学。本夫妇敌体之说,演男女平权之文。绍徽间而疑焉。夫遐荒远服,道不相侔。闰范间仪,事犹难见。登泰山而迷白马,奚翅摸般;游赤水而失元珠,有如买椟。绎如夫子载搜秘籍、博考史书。因瞩目涉女史记载,递及里巷传闻,代为罗织,以备辑录。(译序原文 p1-2)

这种伦理坚持还表现于她对叙事权的捍卫事情当中,按照《八十日环游记》举例,薛绍徽对原著里女性角色所具有的边缘化与被动地位不满意,她在翻译的过程当中为女主人公阿黛(Aouda)赋予颇为详实的情感起伏和自主的行为逻辑,让阿黛的形象更有生气,呈现出中国人所赞许的女性柔美、坚韧的一面^[12]。而且还打破了原著内以男性为中心的单一叙事视角,这种对“女性视界”的再次构造,不只是译者个人情感的倾吐,更是于翻译实践中对女性主体存在做的伦理确认,经由赋予女性形象生命力和主体性来实现,她于男性主导的翻译环境当中硬生生闯出了一片女性的声音天地,说明了她作为译者对性别平等价值的憧憬。

在更宏大的文化范围,薛绍徽的翻译作为体现出一种跨越时代约束的跨文化交往理念,她一直拥有文化平等的道德立场,着手在译文中弱化当时泛滥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为使中国读者在维持文化自尊基础上理解异域文明,她时常采用类比方式把西方的物质景观跟中国文化意象联系起来,例如把伦敦的城市实际市面比作中国式的园林意象。这种处理并非一般的归化,而是一种有着平等基础的文化协商,她想要采用这种方式,处于“再现伦理”所界定的范围,于忠实原文这一基础之上,搭建一种相互敬重、相互参考的交际伦理,结果在晚清所存在的文化语境里,搭建起不同文明平等交流的通道。

3.3 伦理局限

尽管薛绍徽靠着她具有前瞻性的性别立场在晚清译坛独出心裁,但作为身处社会过渡转型期的知识女性,她开展的翻译实践不可避免带有那个时代的思想印记,这种局限一开始呈现出一种浓厚且杂乱的文化保守倾向,在遇上西方现代性冲击的情况,薛绍徽没有去完全认同,而是流露出一种审慎的筛选做法,就《外国列女传》举例而言,她积极介绍西方女性在公共领域所呈现的杰出才识与独立人格,但于道德评判的维度而言,其评价体系还是受到传统“贞洁”观念的作用^[13]。译文里,薛绍徽把分类改编为十章,即女主、后妃、女官、闰媛、文苑、艺林、义烈、教门、私宠和优妓。(原文表述)此十种分类与刘向《列女传》的分类相近,可知最后薛绍徽仍然重视以传统中国对女性的道德标准作分类。如此新思想与旧道德的交错,使得她的译介行为本质上是在传统话语框架内寻求改良的尝试,而非对旧秩序的彻底决裂,反映出译者在重构女性形象时难以摆脱的伦理底色。

在处置涉及个体情感自由跟传统礼教冲突的相关题材时,该局限进一步发展成叙事里的隐晦跟躲避,在像《八十日环游记》等一样的作品中,当文本涉及女性婚姻自主和情感解放等比较激进的话题时,薛绍徽大多运用十分隐晦且有策略性的翻译技巧^[14],她用语言的修饰以及叙事节奏的更改,减弱了原文中可能对传统名教构成直接挑战的相关内容。这种在多重束缚下寻求表达空间的译介方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译作在当时的传播环境,但也折射出她在追求翻译“再现伦理”与维护社会“规范伦理”之间的平衡难题,凸显了女性译者在尝试突破社会叙事边界时所受到的制约。

更为要紧的制约来自于女性翻译主体性在父权结构下的边缘化状况,薛绍徽的译介工作长久处在“夫妇合译”的模式架构里,这种合作形式虽说给她开辟了进入公共文化领域的路径,却也对她的独立译者身份带来了隐性的压

抑,尽管在实际开展文本重组和文学润色的过程中,薛绍徽是真正起着灵魂作用的人物,但在对外的译序以及社交语境里,她大多会将自己定位成辅助方面的“笔录者”^[15]。这种自我边缘化的姿态,是社会性别偏见对女性主体身份的挤压,也是她在寻求翻译实践合法化过程中,不得不向男性权威话语做出的让步。这种伦理上的退让,使得她的职业伦理建构始终置于家庭与性别的双重影响下,构成了其翻译生涯中一段真实的历史写照。

4 单士厘的海外游记译介与伦理探索

单士厘作为近代中国走向国际舞台的女性先行者,其海外游记在跨越地理界限的同时,也完成了一次深刻的跨文化伦理实践。

4.1 游记文本概况

单士厘是一位女性译者,她不仅担任口译,还翻译了下田歌子《家政学》和永江正直《女子教育论》两部日文著作,不过本文的论述重点不在其这两部翻译作品上,此处只是表明她的译者身份。需要说明的是,考虑到单士厘的《家政学》等教材译作受体例约束较重,本文基于“广义译介”视角选择其海外游记,以更直观地展现其跨文化交际与“服务伦理”,并与薛绍徽的案头文本翻译实现“实践”与“文本”的类型互补。单士厘也是中国近代第一位女旅行家。单士厘的代表作品《癸卯旅行记》与《归潜记》^[16],详实记录了她在20世纪初随夫出使日本及欧洲各国的所见所闻。《癸卯旅行记》是首部中国女性撰写的出国旅行记,该书以日记体形式记录了作者1903年2月17日至4月30日历时80天的跨国旅程,途经东京、大阪、海参崴、哈尔滨等十二个城市,全程二万六千余里。书中结合妇女视角对日本明治维新成果、西伯利亚铁路建设及俄国社会状况进行观察,提出教育革新主张并倡导妇女解放。《归潜记》记述的是单士厘旅欧活动的见闻,单士厘随夫遍历英、法、德、荷、意等地。她在向国人介绍西方近代文明的同时,仍念念不忘中华民族传统道德,她反对封建礼教,但推崇东方文明。她始终认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精髓,是西方近代文明所无法比拟的。

这些作品于体裁上打破了传统游记单纯写景抒情的定式,使细致的地理观察跟深刻的社会评论彼此交融,弄出了一种“游记+评论”的复合叙事范式,在呈现翻译伦理的这个阶段,单士厘借助“看”和“被看”的两种视角,及时发现西方现代性与中国传统文化产生的激烈冲突。以一个观察者身份,她用客观的书写办法引介异国科技和社会制度;而作为“遭打量”的对象,她又在异域文化给予的审视之下,着重思考中国女性和整个民族于国际秩序里的边缘状况^[17]。这种双向视角的交换,使得她的文字不仅是对异域文化的译介,更是对民族身份在现代语境下的伦理重构。

4.2 伦理坚守的实践路径

单士厘在游记之中体现出强烈的国民责任感,将女性个体的旅行体验跟国家民族的兴衰紧密联结,她闯过了传统女性生活空间的限制,在作品中多次强调女性作为“国民”要承担的义务和职责,遇到列强的进犯,单士厘的笔端发散出强烈的民族正义感,举例在记录俄国士兵无端搜查中国旅客之时,她所抒发的不只是个人尊严受损的愤懑,更是对清政府腐败无能造成国权流失的深切忧虑。

单士厘显示了很有勇气的文化批判精神,在《归潜记》所涉及的内容里,她一方面对日本教育现代化成功经验予以充分肯定,认为中国借鉴其女学建设很有必要;她也灵敏地发现且披露了日本社会内部日益变大的军国主义倾向,这种情感理性二者并重的伦理实践,很好地展现了她作为文化中介者在秉持民族立场之际,对普适文明价值的用心思索。

4.3 伦理局限

尽管单士厘的视野已拓展至世界领域,但其思想中心还是很难彻底冲开时代的层层禁锢,体现出新旧观念彼此交错的复杂状态,她推崇西方科技文明的同时,也大力倡导女性接受教育,在社会伦理层面还是偏向于维护传统女性道德要求,奋力在现代知识跟旧有道德准则中间寻求一种内在的和谐感。此局限在叙事身份里的体现十分明显:她一直以“贤妻良母”的身份来定位自己,她跨国的游走和书写在很大程度上借助了外交官眷属的特殊身份,这种身份局限造成她部分观点受男性精英话语体系的辖制,就像在引介托尔斯泰等海外人士时,她更多从道德教化以及人格修养角度做评述,而没有充分勘透其文学美学与社会革命的深层要义,这种作出选择性的译介解读,

很好体现了晚清女性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当中，在再度形成自我意识跟秉持传统精粹之间所碰到的深刻矛盾与调和。

5 薛绍徽与单士厘译介实践的伦理共性与时代局限

在前面已对具体译介案例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之上，本章结合切斯特曼的翻译伦理理论，梳理薛绍徽与单士厘在译介实践中的共性伦理抉择与时代局限。其中，薛绍徽侧重于案头文本的间接译介，单士厘则立足于亲历游历的跨文化阐释，两者在译介路径上各有侧重，但本章的比较并非要描绘晚清女性译者群体的整体全景，而是立足微观个案，探寻转型期女性知识分子的伦理抉择。

5.1 共性特征

在晚清这一特殊的社会转型时期，薛绍徽与单士厘的译介实践展现出高度契合的伦理抉择。这种相似性既源于她们个人的生命体验，也是当时政治与文化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结合切斯特曼的翻译伦理框架来看，两人的共通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薛绍徽与单士厘的译介实践最初都发端于性别与译者身份的双重边缘处境。在封建礼教尚未解体的社会格局中，女性长期处于公共视野之外；在当时的学术评价体系内，翻译又常被视作依附于原作的二次创作。然而，这种边缘地位并没有打消她们的创作热情，反而促使她们采取更灵活的策略。基于切斯特曼的“承诺伦理”（Ethics of Commitment），译者的行为源于其对特定信念与社会价值的忠诚。薛、单二人选择翻译和游记书写这类相对隐蔽、也更容易被社会接受的方式，在不直接挑战传统秩序的前提下，借助介绍外国著作与海外见闻，走进了大众视野。薛绍徽选择性译介《外国列女传》等作品，单士厘记录海外见闻，均是在文字缝隙中巧妙介入女性身份关怀。这种从边缘走向公众视野的尝试，不仅践行了她们对女性启蒙的“承诺伦理”，也是一种通过传播新知来争取表达权的有益探索，体现了她们在压抑环境中追求独立意识的自觉。

其次作为早期跨文化交流的先行者，薛绍徽与单士厘身处“西学东渐”与“中体西用”的时代潮流之中，承担起关键的中介角色。两人的翻译实践，集中展现了在处理外来文化与本土传统关系时的沟通智慧。在切斯特曼的理论视角下，这展现了“服务伦理”（Ethics of Service）与“交际伦理”（Ethics of Communication）的高效结合：一方面，为了顺应救亡图存的时代呼唤，她们积极引入西方现代科学和社会思想，体现了翻译服务于社会变革的“服务伦理”；另一方面，为了让国内读者更好地接受这些超前思想，她们又兼顾了本土读者的阅读习惯与心理预期，恪守“交际伦理”，保留并运用了中国传统的文学审美与文言表达框架。这种表达形式上的本土化处理与思想内容上的启蒙引入，并不是简单的盲目顺从，而是经过审慎思考后的伦理选择。她们借助对西方思想的“本土化”重构，有效化解了文化交流中的生疏感，在“他者”与“自我”之间实现从容调和，描摹出特定近代女性知识分子在文化变局中理性务实的伦理姿态。

5.2 时代局限

在晚清这一新旧交替的转折时刻，薛绍徽与单士厘所进行的译介实践虽具开创意义，但其伦理构建不可避免地带有深刻的历史局限。在切斯特曼的伦理框架下，这种局限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传统“规范伦理”对她们的隐形束缚；二是救亡背景下过于强调“服务伦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对原著忠实还原的“再现伦理”。即便如薛绍徽、单士厘这般具有先锋意识的先行者，在选择翻译内容与处理具体文本时，依然需要顾及当时根深蒂固的社会规范（Norm Ethics）。面对西方原著中关于个人情感解放或颠覆传统地位等比较激进的题材，两人通常会采取稳妥的处理方式，对西方女性形象进行适当调整，使她们更符合中国传统中对家国秩序或“贤妻良母”的期待。这种在边缘地带开展的策略性妥协，意味着她们的“承诺伦理”依然需要借助传统秩序来获取合法性，其翻译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在男权主导的环境中争取合法的生存与表达空间。

更深层的局限源于晚清“救亡图存”这一主流意识形态的强力干预。在民族危机日益加剧的历史阶段，翻译活动被赋予了强烈的救国使命，这种偏向实用功能的取向，使得薛、单二人的翻译选择很难彻底摆脱国家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的束缚。在“中体西用”思潮影响下，服务于国家与民族生存的“服务伦理”被推至绝对优先的位置，而忠实呈现西方原著内容以及女性真实生存状态的“再现伦理”（Ethics of Reproduction），则往往被边缘化，或者直接融入到了救国大局的叙事之中。这种优先级的倾斜，导致她们在引入西方文明时常常陷入两难：既想传播新知识来启迪民众，又想守住传统的道德底线。这种在传统与现代、个人与国家之间的不断权衡与折中，成为了薛绍

徽与单士厘翻译伦理中最真实也最沉重的时代烙印。

6 结论

本研究运用系统梳理薛绍徽、单士厘译介实践的方法,尽力展示晚清女性知识分子于特殊时代背景里搭建翻译伦理的具体办法,她们所进行的译介行为并非单纯的语言转换,而是深受外来思潮跟性别意识觉醒共同助长的产物,在文本挑选和重构举措里,她们表现出救国兴邦、开展跨文化交流的责任感,也因为置身男权社会及国家主义宏大叙事的情境里,表现出一定的退让与局限,这种坚守和局限一并存在的情形,给近代翻译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微观且怀有温度的切入点,很好地拓展了研究的性别视野,使长期被边缘化的女性声音在历史的相关叙述中能够展现。

尽管本研究对具有代表性人物的伦理脉络做了厘清,但对晚清女性知识分子群体开展整体研究仍有很大的探索空间,之后的学术钻研能进一步把目光投向更多边缘化译者,借助搜集和梳理书信、日记、手稿等私人资料,查找她们在公开序跋之外更不为人知的情感起伏及深度思索,进而促进对译者主体意识的多维度思考。怎样更贴切地使西方翻译伦理理论融入中国近代历史局面,建设一套有着国际视野还适配本土特色的评价体系,也是后续研究值得大力深耕的方向,借助史料的扩充以及理论的本土性校准,我们有期望在更宏大的跨文化视野之中,公正呈现近代中国女性在文化转型之时所贡献的特殊伦理智慧。

参考文献:

- [1] Chesterman, A. Memes of Translation: The Spread of Ideas in Translation Theory [M].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1997: 169-194.
- [2] 贾立平, 苏新建.翻译伦理下汉语典籍英译的译者主体性[J].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17(02): 125-129.
- [3] 陈振东.翻译的伦理:切斯特曼的五大伦理模式[J].国外理论动态, 2010(03): 85-88.
- [4] 侯丽, 许鲁之.从Andrew Chesterman的五个翻译伦理模式谈译者主体对翻译伦理的坚守[J].外国语文, 2013, 29(06): 133-136.
- [5] Simon, S. Gender in Translation: Cultural Identity and the Politics of Transmission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12-13.
- [6] 吴慧珍.回顾与反思: 国内翻译伦理十年研究(2001-2010)[J].上海翻译, 2012(01): 24-28.
- [7] 儒勒·凡尔纳.八十日环游记[M].陈寿彭,薛绍徽,译.上海:上海经世文社,1900.
- [8] 罗列.论 20 世纪初中国女性译者的间接翻译及自觉意识[J].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2014(03): 71-77.
- [9] 季传峰, 孙小森.薛绍徽译《八十日环游记》的翻译规范研究[J].常州工学院学报(社科版), 2018, 36(02): 67-71.
- [10] 刘立香.历史语境下的翻译偏离及其接受——基于薛绍徽翻译《八十日环游记》的研究[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02): 110-113.
- [11] 薛绍徽, 陈寿彭.外国列女传[M].金陵:江楚编译官书总局,1906:1-10.
- [12] 陈芯茹.二十世纪初女性翻译文学文本研究[D].暨南大学, 2022: 77.
- [13] 徐玮.传统与现代之间: 薛绍徽《外国列女传》的翻译与编纂策略[J].商丘师范学院学报, 2014, 30(04): 65-67.
- [14] 许澄莹.女性译者主体的显身: 以薛绍徽译《八十日环游记》为例[D].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2:30-34.
- [15] 罗列.女翻译家薛绍徽与《八十日环游记》中女性形象的重构[J].外国语言文学, 2008, 25(04): 262-267.
- [16] 钱单士厘.癸卯旅行记·归潜记[M].杨坚, 校点.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
- [17] 周晨曦.“迎合”与“抵抗”之间——晚清游记《癸卯旅行记》中的女性视界[J].文学评论, 2021(01): 194-203.

Adherence and Limitations of Translation Ethics among Late Qing Female Intellectuals: A Case Study of the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Practices of Xue Shaohui and Shan Shili

WU Haiping¹

¹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hongqing Jiaotong University, Chongqing, China

Abstract: The late Qing period saw the collective rise of female translators, adding a gendered perspective to the eastward spread of Western learning. Drawing on Andrew Chesterman's five models of translation ethics,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ethical choices and constraints in the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practices of two pioneering late Qing women, Xue Shaohui and Shan Shili.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is understood broadly to include translated texts and travel writings that introduced foreign cultures to Chinese readers. Xue Shaohui, in works such as *Waiguo Lienü Zhuan*, adhered to the ethics of commitment, seeking a balance between Confucian morality and Western progressive ideas. Shan Shili's overseas travel writings combined the ethics of communication and service, reflecting a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to broaden Chinese worldviews. Despite their patriotic consciousness and gender awakening, their translation ethics were historically constrained by the era, classical Chinese conventions, and reliance on male collaborators. Framed by Chesterman's translation ethics, this comparative study of Xue Shaohui and Shan Shili illuminates late Qing female intellectuals' ethical logic and historical limits, enriching micro-perspectives in women's translation history with concrete cases.

Keywords: Late Qing women; translation ethics; Chesterman; Xue Shaohui; Shan Shili;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practices